

# 转型期社会心态失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周小春

(中共平阳县党校, 浙江 平阳 32540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心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焦虑浮躁、抱怨冷漠、仇富恨官、群体性怨恨等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道新考题。党和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健康发展, 匡正失范行为, 缓解、化解不良心态, 从根本上着力消除不良社会心态滋生蔓延的现实土壤。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社会心态; 失衡成因; 疏导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12)03-0311-5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 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 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社会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前, 中国经济成分的单一性以及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的相对稳定性, 社会心态呈单一性、稳定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传统利益格局正发生革命性调整, 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在急剧转型中, 社会心态也发生转型、重组, 呈现复杂多元的形态。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主流是积极健康的, 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仇富恨官、焦虑浮躁、群体性怨恨等不良的社会心态, 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把“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如何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 消除不良社会心态滋长的环境, 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是一个重大新课题。

## 一、转型期社会心态失衡的新特点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利益分配的旧机制。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社会心态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一) 民生问题是社会心态的情结, 焦虑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民生不仅涉及社会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 又涉及社会民众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内涵, 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凡食品安全、收入分配、住房、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治安、环保等民生问题, 都会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影响着民众情绪波动, 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心理状况。2012年2月, 搜狐网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 71.3%的居民认为2011年通胀情况较高, 其中超过三成居民(33.2%)认为通货膨胀形势“高的难以忍受”, 为应对高通胀, 35.4%的人已经在缩减开支。高通胀加大住房教育医疗压力, 三者比例之和为58.1%, 低收入家庭来自以上三方面的压力明显大于

中高收入家庭(比例依次为60.4%, 58.1%和54.7%), 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 高通胀加大民众生活压力, 加重民众的“焦虑”。

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 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心态。据《环球》杂志联合搜狐网的调查显示, 截至2011年3月6日, 在参与投票的24743名网民中, 有62.33%的人明显感受到生活、工作压力, 并为此焦虑不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竞争加剧, 物价上涨、买房难、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 “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胶囊”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刻撩动民众的神经;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读书无用论”等思想困惑, 纠缠着民众的心理; 高楼玻璃幕墙坠落、商厦自动扶梯骤停、大桥相继坍塌、高铁事故尤其是7.23温州动车事故等公共设施事故使民众恐慌, 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焦虑之中, 从而上演了比日本海啸还恐慌的“盐慌”, 非理性抢购行为的背后反映出民众的浮躁、焦虑、不淡定的虚弱心态。

(二) 不公平感增强, 弱势心理在社会各阶层滋生蔓延

不同时代不同个体, 面对不同的问题, 对公平有着不同的理解。随着30多年的快速发展, 民众追求公平的意识逐渐增强, 但发展扩大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 加速了阶层分化, 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主流与边缘会不断发生着转化, 缺乏稳定感, 人们通过社会比较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在社会内部分化过程中,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就会感到冤枉、气愤, 甚至产生报复行为, 这种心理和行为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逐步形成“弱势心态”。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中, 还出现了因制度壁垒、权利缺位等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公平的边缘化、弱势化现象, 在一些制度设计中, 由于缺乏对个体权利应有的普遍尊重和保护, 弱化了公民权利, 权力与资本的相对集中导致了社会排斥性体制的形成, 当一些群体与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获得越

作者简介: 周小春, (1971-), 女, 浙江平阳, 讲师, 研究方向政治学。

来越多社会资源的时候,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却因为获取资源的有限性而逐渐被抛到了主流社会发展的轨道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心理”自然会迅速蔓延。2010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对不同群体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选取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公司白领三个典型群体,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45.1%的受访党政干部、57.8%的受访公司白领和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73.5%的参与调查的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在一般人看来,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及公司白领应该属于精英阶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当前转型条件下,收入差距、生活重压、公平感保障感缺失催化民众的“弱势感”,由于缺乏稳定的预期、刚性的制度、公平公正的程序产生不安全感。这种“弱势感”、“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传统弱势群体身上,也同样存在于诸如官员群体、白领阶层身上。

### (三) 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怀疑心态不断滋长

7.23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之后,两句网络语言“这是一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广为流传,字里行间透露老百姓的无奈及怀疑的调侃,政府的表态、专家的解释、媒体的报道,这些最具有公信力的群体都成了老百姓怀疑的对象,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1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令人担忧的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因诚信缺失,老百姓成了“老不信”,“怀疑一切”的纠结,已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里。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诚信成本太高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事故不断上演。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曹操墓之争、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郭美美事件等多领域造假丑闻频出。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政治领域的失信于民、社会领域的坑蒙拐骗、个人生活的言而无信,这些不诚信的现象无不拷问着社会信任危机,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压力是不容乐观的。2011年,中科院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接连发生的失信案例,也使“诚信无用论”、“讲诚信吃亏”等消极的社会心态有所抬头,社会公信力不断下降,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 (四) 社会“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我爸是李刚”,是2010年最触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出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提出“群体性怨恨”心态被认为是当前诸多热点事件背后的民众情绪基础。社会“群体性怨恨”源于民众对

所处现状的不满情绪,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这种非理性心态也是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而成的,如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据有关部门对网络舆论专题调研显示,互联网热点话题比较容易集中在八个方面爆发,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涉“官”、涉“腐”、涉“富”或贫富差距的话题,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仇官仇富”心理,这种“双仇”的怨恨心理在网络上似乎成了一种主流民意。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微博客的新的传播方式的运用,使得区域性的、某一类的网络围观的舆情热点容易发酵形成全国性的、超范围的网下舆论热点,这种网上与网下的情绪叠加,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虚拟和现实互动,导致剧烈的情绪变动。“7.23”温州动车事故、浙江乐清钱云会命案、郭美美事件,每一事件的变动趋势都不是一己之力,而是通过当事人、网络媒体人、大量网友、网络意见领袖、专家学者等网上与网下的相互“给力”,大大增加了社会情绪影响能量,甚至形成巨大的“群体压力”左右事件的走向。近些年来,一些因“细微事件”或“日常纠纷”引发,众多“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大量参与,主要以党政机关为攻击目标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这些事件背后的群体怨恨情绪或社会心理基础令人担忧。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10年安徽的“马鞍山事件”、2011年浙江的“海宁事件”等。

## 二、转型期我国社会心态失衡的形成原因

### (一) 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30多年,这30多年几乎走过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么快的发展速度相当于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两个压缩”。一是发展时间的压缩。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自然发展,社会心态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自然养成、自然磨合、自然适应。而中国只用30多年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迅速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速度战”使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惊人的成果,使我国迅速跨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但快节奏、单纯追求速度也造就了一批浮躁、焦虑的民众。因此,速成的社会、速成的心态,各种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挤压到一起。二是发展空间的压缩。资本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是有代价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西方社会在资本发育前期利用海外殖民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西方社会内部矛盾并不大。当中国搞市场经济时,资本发展空间有限,客观上导致了把劳资矛盾压缩在国内,造成了道德滑坡、信仰混乱。发展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压缩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导致当前社会心态多元化。

### (二) 社会公平正义部分缺失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社会公正则国民心态平和,社会不公则会导致国民心态失衡。近年来,各阶层各群体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对社会公平的诉求



比较强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前社会心态。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公正包括分配公正、秩序公正、司法公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分配不公,这是民众心理上所能接受的;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公共政策制定的缺位和执行的不到位、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造成的起点不公平、交换不公平、分配不公平、规则不公正、程序不公正,造成民众不能共享改革成果。社会不公促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部分民众产生了相对的剥夺感,心理公平感失衡,怨恨由此产生。政治上权力腐败、社会生活上道德滑坡、垄断、“拼爹”等不良现象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激发民众对官员、富人的怨恨,这种“仇官”“仇富”偏激心态在现实中不断被放大,极易影响社会稳定,诸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受阻,“社会阶层固化”的态势明显,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社会流动的资源、机会开始出现集中趋势,“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强者通吃”等不公平现象必然削弱民众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抱怨、不满开始显化,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强化,推动了社会民众的心态失衡,引发社会矛盾。

### (三)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失衡是社会心态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使民众在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时缺乏从容的心态,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4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从社会发展指标看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缺口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历史欠账太多,民众社会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尤其是2010年以来,CPI不断上涨,工资不涨,普遍增加了民众的生活压力。据2010年底《人民日报》调查,“房奴”、“车奴”、“卡奴”、“孩奴”等沉重的生活压力,透支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半生财富,已有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问题仍困扰着相当数量的民众,而社会支持功能不够。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若得不到社会支持,民众就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甚至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的连续自杀事件。

### (四) 社会精英阶层“榜样示范”失效

人类社会的精英群体大致有三类: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一个社会的心态还取决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心态与作为,精英群体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精英群体的成员大量源于社会层面,渠道较广泛,出现了明显的“精英循环”现象,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作用,对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强烈的利益驱动、普遍的社会焦虑氛围、规则缺失及过度依赖政府等,使中国现阶段

的精英群体出现越过职业边界扩张自身利益、侵占民众利益、自我壁垒化现象,形成政治精英群体(党政干部)借助公共资源的优势、以种种寻租方式扩张利益和经济精英群体通过非市场化、非竞争方式迅速积累财富的局面,造成金钱政治、官商勾结的社会状态。党员干部的腐败、经济精英的不正当致富、知识精英的依附权势大大降低了社会公信力,造成了社会“信任危机”,普通民众出现了“仇官”“仇富”的不满情绪。精英群体的壁垒化和封闭化倾向,进一步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扭曲社会流动的渠道,造成社会不公平,对社会团结和合作产生不良影响,恶化社会心态。一项对全国37所高校近7万学生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分别是1 2.5 17.8 12.8 9.4,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机会分别是1 4 31.7 22.6 17.4,出现了“穷二代”、“蚁族”、“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现象,加剧民众的焦虑和怨恨。

### (五) 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是一个过程,而利益表达则是利益实现的首要环节,而政府设置的利益表达渠道已无力满足日趋多样化的利益诉求需要,诉求多元化与诉求渠道单一化的矛盾日益凸显,使得单一化的信访形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群众诉求的需求。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从总体上看,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能力“城市高于农村,文化层次高的高于文化层次低的,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上,弱势群体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相当薄弱。

弱势群体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上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比较单一,主要向行政部门表达,在合理利益诉求受到阻挠的情况下,很多民众面对合理合法利益诉求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到哪里去求助,社会心态便会发生急剧变化,产生失望、愤怒,特别是那些在利益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更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误区,采用“闹大维权”的“升压法”,越来越多地采取诸如静坐、集体上访、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偏激行为来宣泄自己的利益诉求,导致正常的利益期待演化成为恶化的社会心态,有时甚至酝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 三、以科学的理念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道新考题。民本和公平是良好社会心态的“两翼”,是消解社会心态失衡的两剂“良药”,“说话”、“发声”是民众利益表达的基本手段,是不良社会情绪的“出气口”、“减压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培植良好社会心态的“土壤”，逐步培育民众以理性思考、包容心态回应社会心态多样化。

(一) 深入科学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心态监测预警系统。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一套公众社会心态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成为政局的“预警员”。这种社会心态的调查，通过对公众社会态度的监测，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使政府及时以恰当方式给予平息，这也是民众宣泄不满情绪的恰当渠道，补充官方正式沟通信息的不足。各级政府可以建立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或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方式展开民众社会心态调查，及时对社会舆情进行汇集和分析，及时掌握社会心态的波动规律，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依据之一。

2、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民众的生活压力和社会风险来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政府要及时做好社会风险防范，提升群众安全感。从政府层面不断完善民众关注的食品、交通、医疗等方面的监管体系，消除民众的焦虑感、不安全感；从公民角度看，政府要不断提高民众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行为，特别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们所面对风险的差异，防止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情况下的“风险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政府要积极拓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支持力量，通过民间和社会组织力量来帮助困难群体，通过民政和其他社会服务部门完善社会社会应急救助体系，逐步形成常态的应对物价上涨、灾害、失业、重大疾病、伤亡等困难、困境的援助体系，减少民众身心的压力，为困难群众编织一个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能共享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二) 以民主、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重塑社会信任

1、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一方面政府要依法保障公民民主权利。不断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做到政务公开，重大事件调查（如7.23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真相等）、重大决策（如平阳县城乡统筹改革）要向民众公开，让民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赢得民众的理解、支持、参与，“让群众知情、解群众疑惑、保群众满意、赢群众信任”。政府重大决策从制定、形成、执行要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凝聚民意，各项决策要做到程序依法规范、过程民主公开、结果科学公众。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重塑信任。完善社会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尤其是网络监督，增强人们的社会信任感与凝聚力，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中国网民数已经达到4.57亿之多，分布在各个阶层、群体和地域，网民参政意识不断增强，网络民意越来越具有代表性。网络监督不仅仅指对官员的监督，更是人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

重要方式。由于网络空间的自由环境，网民能以匿名的方式举报、公布腐败事件，将腐败行为快速广泛地加以曝光。网络监督能给有腐败心理的人以极大的威慑力，促使他们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倡廉的目的。但网络监督利弊并存，要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网络监督。通过设立官方监督举报受理网站和各种网络平台，实行实名制的信息举报采集方式，主动搜集网络舆论，通过网络发言人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和举报的案件作出回应，批驳失实消息，发布真实信息，引导广大网民理性监督、合法监督。

2、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部长级会议上指出“我们应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现在社会上炒作“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等，表达的是对机会不公平的不满。违背机会公平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因素；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造成社会群体享受公共消费不平等，影响了弱势群体的上升流动，也有制度、政策和潜规则造成的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首先，政府要努力弥补历史“欠帐”。政府在制定和出台任何宏观政策，都要考虑政策的公正，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发展机会，还应对以往制定的缺乏公正性并带有明显歧视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坚决的改革和纠正，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如老百姓关注的保障房、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向农村薄弱地区、贫困群体倾斜，缩短城乡差距、地区差别；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剥离附着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促进各阶层合理流动，逐步使每个人的发展机会更公平，消除民众的“弱势心理”。其次，建立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理顺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对于先富群体，要运用税收制度进行合理调整，通过法律、法规杜绝其不合法、不合理收入，运用社会道德教育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先富”帮“后富”；对于弱势群体，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使其能通过诚实劳动提升生活质量，逐步缩短贫富差距，消除弱势群体的焦虑，民众的“仇官”、“仇富”心态，缓和社会矛盾。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铺一张“社会安全网”。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提高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尤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诉求，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社会信任感。

(三) 重视公众诉求，着力构建畅通的民意诉求机制

1、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党和政府应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制度性平台，使多元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到公共决策中供决策者调控、整合、汲取，从而推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决策。一方面要强化人大、政协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的职能，建立制度化的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协商谈判、听证、



公民投票,召集利益相关社会阶层、群体代表尤其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代表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协商,实行各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 and 有序化。另一方面要以法律、政策引导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利益诉求、提供社会服务、协调利益矛盾、实现社会良性沟通方面的积极作用,强化社区、工、青、妇和其它民间社团的群体利益表达功能,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和民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为不同群体提供表达意见和宣泄情绪的平台。

2、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减压阀”,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当前,导致群众情绪不畅的根本原因是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政府要运用多种方式进行舆论正面引导。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些重大、敏感事件和重要政策方面,一定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及时快捷反馈民意,一改过去“捂”、“瞒”等“堵”的工作方式,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微博、博客等现代网络工具,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把握话语权,让群众获得主流、及时、准确的信息。同时,还要引导、规范媒体网络的作用。在这信息与知识不断创新的时代,媒体网络对社会心态的影响越加深刻。媒体网络是舆论的“喉舌”,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架”在众多关系上的一座“桥梁”,是连接上层与基层的“纽带”,从当前实践看,媒体网络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追踪报道与披露,有利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有利于社会公众情绪的疏导,在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系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引导、规范媒体网络在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报道中,要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原则,还原事件之本质,以健康的心态引导社会公众。要充分关注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报道中所引发的放大效应、诱发效应,甚至负面效应。如2011年的“抢盐风波”,那非理性的抢购行为、内心急剧的恐慌,正是媒体网络长时间、多频道播报日本地震、海啸所引发的放大效应、负面效应。要坚决依法遏制一些媒体网络为吸引眼球、迎合部分受众的心理而渲染和炒作一些极端、非理性的宣泄。

(四)坚持正面引导,着力深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创新宣传方式,建立浓厚的道德文化环境。正确的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赖以生成和巩固的内在心理机制,一是政府要善于借“题”发挥。善于利用国家和社会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如2008年的奥运会、“神七”上天、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从而

引领民众正确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用,学会在利己利他、权利义务的关系中实现个人价值;善于创建宣传载体,利用全国、各省市“十大感动人物”等评选活动契机,树立正面的道德标兵,宣讲普通人的优秀事迹,如“最美的妈妈”、“最美的教师”、“最美的司机”等,以最普通的行为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要注重基地建设,尤其是社区、学校、网络建设,以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文字信息、视觉形象、道德专题讲座等形式,建立浓厚的道德文化环境,正如苏霍姆斯基所说“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使人目之所及、心之所感都是“道德文章”,努力培养公民的“知耻”意识,明确荣辱界限;三要立足于传统文化教育。要注重中国民众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从人们生产生活角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2012年温州地区开展的公民道德论坛活动,党委政府的精心组织、义工老师的现身说法、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感恩”的主题、孝的文化,感动着每一个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政府部门还要引导规范“国学”的复兴,让琅琅上口的“国学”进家庭、入学校,从娃娃抓起,从点滴做起,逐步建立浓厚的道德文化氛围,培植良好社会心态的“道德土壤”。

2、树立精英群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让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为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坚定的信仰消除民众的迷茫浮躁,精英群体既要身体力行,做好实践者,又要宣传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做好引领者。政治精英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对理论在实践运用中的价值和成效的体悟最深,也最有发言权。要通过制度、体制、政策等价值规范的制定,把价值导向由价值观念转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5月28日,浙江省正式颁布实施《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纲要》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要求具体表述为“守规则、重礼仪、懂感恩、讲诚信、有责任、做好事”18个字。首次加入了诚信体系建设,着眼于建设“信用浙江”,以浅显易懂的字眼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经济精英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要树立“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理念,肩负社会责任感,重塑民众的信任。知识精英是社会的良心,专家、教授要积极通过理论文章、讲座、权威访谈、编写通俗理论读物等理论宣传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哲学、文学、艺术、传播等各学科之中,从而实现理论宣传的思想性、实用性、趣味性;媒体记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下基层、讲真话、说真情、揭丑陋,借助网络、报刊对社会舆论进行积极导向。

参考文献:

- [1] 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05  
[2] 习文等:《科学分析和看待当前社会心态》,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2011-09-08

- [3] 曹勃亚:《发展中说变化》,《时事报告》2011-09-08  
[4] 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新华网,2011-05  
[5] 冯琦:我们为何“群体焦虑”[J],环球,2011-06  
责任编辑:杨锐